



贵州地方戏曲剧种史丛书

黔北花灯初探

崔克勤 蔡明均 李永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地方戏曲剧种史丛书

黔北花灯初探

崔克昌 夏明钧 李永林

贵州省文化出版厅《戏曲志》编辑部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地方戏曲剧种史丛书

主 编 俞 百 巍

副主编 卢 鸿 汝

《黔北花灯初探》责任编辑 闻 文

贵州地方戏曲剧种史丛书

黔 北 花 灯 初 探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中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2插页92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20册

书 号：10115.669 定 价：0.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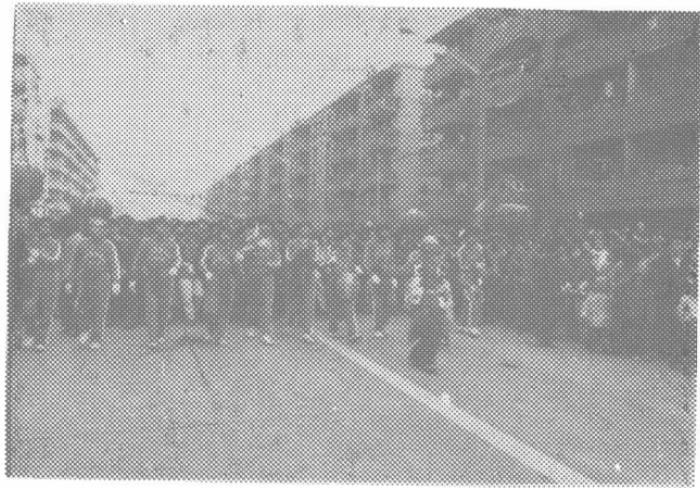
1957年3月，我省民间艺术代表团（黔北花灯代表）在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演出“红军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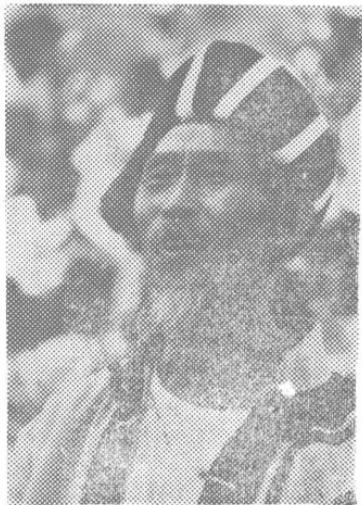
花灯老人蔡恒昌（左）演唱“红军灯”



花灯老艺人李祖德演唱“红军送我一把壶”



遵义花灯队庆祝“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土家族花灯老艺
人文国朝唱花灯



花灯老艺人李祖德示范
表演动作



遵义县中寺(建于明代)石刻《大象耕田图》

(注: 图中人象舞姿翩翩,可惜头部被损坏)

出版说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全国戏曲工作有了很大成绩，戏曲理论研究也正在蓬勃开展。我省文化出版厅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十分重视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史的调查、研究和编写工作。一年多来，《戏曲志》编辑部组织作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编写著述的工作，取得了这一科研项目阶段性的部份成果。目前，正在积极完成各种地方戏曲剧种史的编写计划。我们决定陆续出版这套《贵州地方戏曲剧种史丛书》。这不仅是戏曲理论研究工作一项具有历史价值的基本建设，而且是我省戏曲出版事业的一个创举和一件大事。

贵州地方戏绚丽多彩，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是我省各族人民和戏曲工作者智慧与劳动的艺术结晶，是祖国文艺百花园中别具异彩的鲜花。我们相信，《贵州地方戏曲剧种史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仅是对全国戏曲理论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且必将对我省戏曲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1985年12月

序

几百年来，流传在贵州广大农村的“花灯”演唱艺术，是泥土气息浓郁的一株山花。可是在史料记载方面，只能在贵州各府、县志的《风俗篇》里找到屈指可数的几行。黔北花灯也是如此。

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我才七、八岁的时候，住在遵义县的泮水乡场上。一到春节，就和同龄的一伙儿童，每晚尾随花灯班挨户观看花灯。喧闹的锣鼓声，婉转的歌声，生动的舞姿，逗人呵呵大笑的“唐二串（liáo）白”，我越看越不想离开，深深被这质朴的民间艺术所吸引住了。

1947年春天，我在遵义城里教书，有空回到了我儿时生活过的家乡泮水，专程拜访过一位花灯民间艺人李文才，记录了他演唱的若干首花灯曲调。他甚至很慷慨地把他的手抄本花灯唱词，也借给我抄录。这样，我总算把多年来的愿望——记录花灯词曲这一工作，开始迈出了第一步。

1950年初，遵义刚解放。为了向新解放区的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我和陈福桐、傅邦荣两同志一起，编写了一本《胜利花灯》。1950年3月，我被调到贵阳师范学院艺术科工作后，又和体育科的龙吟老师合作，编写了大型花灯歌舞，组织了体育科、艺术科的部分同学排练，到贵阳市的街头演出，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由于长期热爱花灯艺术，1957

年春，我被调到贵州省花灯剧团，从事专业的花灯音乐研究及编写工作。但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只是单打一地为音乐创作而搜集了一些资料。至于花灯历史资料方面，搜集、记录的就不多了。

这次，崔克昌、夏明钧、李永林三位花灯艺术业余爱好者，花了很大的精力，搜集了不少史料来编写这本《黔北花灯初探》，可说是作了一件大好事，替我们从事花灯艺术专业的工作者们，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

作为“黔北花灯”史或志的资料，这本集子所提供的素材，的确有相当的份量，但作为黔北十三个县、市的花灯艺术活动的全面史料，还有待大家更深入普遍地进行采集、整理的工作。

本书详述了“黔北花灯”中的“新闻灯”，并列举了它突出地反映当时的时事新闻内容的一些节目。这一特色，别的地区当然也有，但就我们搜集到手的资料来看，究竟不如黔北的数量多。像：《辛亥革命灯》、《光绪皇驾崩》、《水打狮子桥》、《修马路》、《王家烈打仗》、《千人灯》、《戒烟歌》、《拉兵歌》等，说出了当时当地广大人民对旧社会最为痛恨的内心话。1935年，红军经过遵义，花灯艺人蔡炳章、蔡恒昌兄弟、赵文彬、刘二木匠等，继承了新闻灯迅速反映现实的传统，并有所创新地各自编演了《红军灯》来歌颂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表达了“千人”对红军的爱戴。从数量上就可看出黔北的花灯民间艺人们，早在若干年前，就注意了反映现实生活，而且亲口、亲身一代一代地继承发扬了这个优良的传统。

作为热爱花灯，并从事花灯艺术多年的一名文艺工作

者，我很高兴读到三位青年同志的这本著述。希望他们三位同志，以及其他有志从事花灯史、志编写工作的同志，再继续努力，为今后编写黔北花灯乃至全省花灯艺术的史、志，作出更大的成绩。

潘名挥

1985·11·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黔北花灯的历史状况.....	(1)
一、概述.....	(1)
二、史志记载与古迹雕刻.....	(4)
三、贵州余庆花灯与广西乐业花灯的 历史渊源.....	(9)
第二章 黔北花灯的流行.....	(17)
一、花灯与民俗.....	(17)
二、仁怀县的花灯.....	(20)
三、务川县鹿坪的花灯.....	(24)
第三章 黔北花灯的内容与形式.....	(31)
一、组班和演出程式.....	(31)
二、新闻灯.....	(45)
三、剧目、剧本及戏剧表演.....	(61)
四、唐二与幺妹.....	(71)
五、艺术特点.....	(76)
第四章 黔北花灯的发展.....	(99)
一、解放后部分会演.....	(99)
二、部分演员情况.....	(95)
三、原遵义市花灯剧团始末.....	(101)

附录

一、红军灯.....	(108)
二、红军送我一把壶.....	(114)
三、千人灯.....	(122)
四、胜利花灯.....	(123)
后记.....	(137)

第一章 黔北花灯的历史状况

一、概 述

黔北花灯是贵州花灯的支脉之一，是一种深受群众喜爱、流传很广的民间艺术，是一种包括歌舞、戏剧、说唱等的综合性表演形式。

黔北地区，今设遵义地区行署，辖十三个县（市）：遵义、绥阳、湄潭、余庆、凤冈、务川、道真、正安、桐梓、习水、赤水、仁怀及遵义市。文化历史名城遵义市是黔北的政治、经济、商业、交通、文化中心，为行署所在地。

黔北地区，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北部。西北面的赤水河谷和北面大娄山脉与四川盆地接壤；东部与本省铜仁地区的沿河、德江、思南、石阡等县相连；南临乌江，与本省的金沙、息烽、开阳、瓮安、黄平、施秉等县交界。

黔北的大娄山脉，山峦重迭，莽莽苍苍，间有高原丘陵坝子，乌江、芙蓉江和赤水河奔腾直泻，地形复杂，属典型的高原型地貌。

素称贵州仓库的黔北，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居住着汉、苗、彝、土家、仡佬、瑶、回等民族，他们世代繁衍，共开疆土，并享受着自己创造的文化艺术。

过去，黔北遵义地区一带也叫过播州。若论黔北的历史，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统治播州长达725年的“杨氏家

族”。唐朝后期，云南境内的南诏政权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向四周发动了大规模的征战，兵犯贵州，盘踞了播州，唐王朝于是募兵反击。当时在长安的杨端应募率兵前往，打退了占领播州的南诏兵，并在此确立了世袭地位。在“杨氏家族”统治的时期里，播州出现过一些政治上开明的杰出人物，对外也有过不少有益的交往，使当时的生产、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两次派兵南下（即所谓“调北南征”）占据云南、贵州，并以播州为屯兵粮草重地，筑了播州城。有人认为从那时起，春节期间贵州民间就有了玩唱花灯的风俗，黔北一带自不例外。

1599年5月杨氏第二十九代土司杨应龙起兵反叛明王朝。朝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派遣李化龙调集陕、甘、浙、湖广、云南、四川、贵州的八路大军，进剿杨应龙，从此结束了杨氏家族在播州的统治。明朝在播州实行了“改土归流”。由于各省官兵的进驻及从外省大量移民，使播州当时的文化得到广泛的交融，给花灯这种民间艺术和其他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明末清初，黔北的局势又一直动荡不安，清军“征剿”水西，吴三桂制造的战乱，皆波及遵义，人民生活异常艰难。直到清朝鼎盛时期，战乱平息，局势安定，作为黔北地区民间艺术形式之一的花灯，才有了较大的发展。

黔北地区原属四川管辖，清雍正五年（1727年）才改隶贵州。由于历史、地理、行政区划等原因，巴蜀文化对黔北文化产生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现从黔北花灯的剧目、声腔、表演等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不少的印记。随着黔北城镇的兴

起，城乡交流频繁及各种艺术形式的融混，使花灯（包括花灯戏）日渐繁荣。

对黔北地区民族成份的估价已与过去不同，过去把它单纯说成是汉族地区的说法已应改变。黔北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也有玩唱花灯的习惯，如遵义县、仁怀县的苗族、仡佬族；务川县、道真县的土家族、仡佬族都有唱花灯（“苗灯”、“仡佬灯”）的习俗。可见少数民族花灯与汉族花灯是有渊源关系的。

随着清朝封建统治的土崩瓦解，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使黔北人民的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群众创作了“新闻灯”的唱词内容，来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和意见。随着阶级关系的复杂化和矛盾的尖锐激烈，也产生了不少反映阶级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花灯唱词。

在旧中国统治的漫长岁月里，黔北花灯中，也曾出现过很多针砭时弊，反对黑暗暴政之作，抒发了群众的抑郁和不满，表达了追求光明、向往革命的强烈愿望。1935年初，红军长征路经黔北，是黔北历史上的特大事件。光辉的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政治影响。群众怀着对红军的热爱，用自己熟悉的花灯艺术形式来讴歌红军、颂扬长征，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灯”（如“红军灯”等），成为黔北艺术史上得天独厚的宝贵财富。花灯悲人民之悲，喜人民之喜。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遵义各乡花灯队踊跃进城，献演庆祝，表现了人民群众对自己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

1949年底，黔北人民群众欢天喜地迎接解放，花灯活动又掀起了新的热潮，在一部分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带动下，黔

北各县、区、乡的花灯搞得蓬蓬勃勃。在国家经济建设高潮时期的年代，是黔北花灯空前的繁荣昌盛时期，那时人才辈出，花灯作品不少，在全省享有显著声誉。1958年遵义全地区的工农兵文艺会演，花灯节目占了很大比重。在这次会演基础上，开始组建了黔北历史上的第一个专业花灯剧团——遵义市花灯剧团。随之而来的1960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剧团解散了。众所周知的1966年—1976年的十年动乱，花灯也和其他艺术一样横遭摧残。粉碎“四人帮”后，花灯艺术又开始复苏，各地花灯队纷纷恢复活动，排演节目，兴高采烈地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政策开放以后，花灯活动更加活跃，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隆重日子里，遵义市就有十七个花灯队进城作了祝贺演出。

建国以来各级文化部门一贯重视民间花灯艺术的发展，积极发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抢救各地老艺人掌握的技艺，使之不至失传；同时，组织花灯演唱，进行采风活动搜集资料，作了不少工作。

二、史志记载与古迹雕刻

黔北各地的旧地方志中，记载了不少关于花灯的资料，对我们探索黔北花灯的兴起、发展、花灯的艺术状况及花灯与民族风俗习惯等，都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

较早见于典籍中有关黔北花灯记载的资料，要算成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的《平越直隶州志》“风俗篇”，因今属遵